

《1984》中的反抗与革命

董 英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 在《1984》中,奥威尔写出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严酷性,但整部小说又是围绕着主人公对于极权的反抗来叙事的,包括以思想犯罪的方式进行的心灵的反叛;以身体为武器,用性爱来反叛极权主义的性政治;以及通过革命暴动来动员无产者推翻极权统治。《1984》中所有的反抗和革命都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价值,它们本身彰显了人性的力量。同时,作者也对革命崇拜本身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可能仍然内在地蕴涵着极权的因素。

关键词: 奥威尔;《1984》;极权政治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4-0066-04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Nineteen Eighty - Four*

DONG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Nineteen Eighty - Four* not only reveals the totalitarian politics in depth, it also presents Winston's three steps of anti - totalitarianism: Thought crime, physical rebell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secret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to try to overthrow the rule of totalitarianism. Although all these rebellions have been complete failure, they manifest the power of human nature. Orwell has also broken down simple worship of revolutions. He suggests that there may be latent internal totalitarian logic in modern revolutions.

Key words: Orwell; *Nineteen Eighty - Four*; totalitarian politics

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思想中,“反抗”、“革命”一直是被严肃探讨的政治主题。《1984》是奥威尔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由于作者的早逝,这部小说成为其小说创作的绝响,是他对于自己一生政治思考以及文学创作的最后总结。奥威尔写出了极权主义专制统治的严酷性,但整部作品又是围绕着对极权的反抗来叙事的。《1984》中,一方面层层深入地揭示极权政治,另一方面又演绎了反抗极权主义的三部曲。小说第一部中,主人公以思想犯罪的方式进行心灵的反叛;第二部,主人公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用性爱的欢愉和激情来反抗;同时他们也加入地下反抗组织兄弟会(尽管是一个陷阱),开始

革命工作;第三部,在极权主义的大洋国的专政机构——“友爱部”中,主人公身经拷打、刑罚和改造,顽强维护着自己的意志和内在的完整性。尽管所有的反抗都失败了,反抗者最终被彻底打垮,但是反抗本身彰显了人性的力量。另外,作为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奥威尔意识到战胜极权主义的希望在于无产者的革命,这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然而常被忽略的观点。

一 心灵反抗与思想犯罪

奥威尔在《1984》中借一篇《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指出:极权主义最为害怕的

收稿日期: 2011-03-0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基金资助项目“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政治思想研究”(10C0648)

作者简介: 董 英(1972-),女,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从统治者中分裂出去,尤其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1]在《1984》中的大洋国,思想犯罪是最危险的犯罪,是友爱部、思想警察、101 囚室(专门处理危险政治犯的恐怖囚室)竭力要扑杀的罪行。心灵反抗和思想自由如同永远不可扑灭的火苗,随时可能侵蚀极权政治的统治基础。正因为如此,在大洋国,异端、公敌、思想犯罪要被一个接一个地甄选出来,成为极权主义的祭品。

从奥威尔创作历程来看,《1984》中的主人公——作为思想犯罪主犯的温斯顿,延续了他一系列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特质。奥威尔在《缅甸岁月》《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向维冈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精神特质都有很强的奥威尔个人色彩,或本就是他的叙述。小说中都叙述了这样一个主人公的精神履历,他善于自我内省,用自己的内心去观察一个带有罪恶感的社会,并与这样一个荒唐的世界紧张地对峙。这样一个主人公,从缅甸、巴黎、伦敦、英格兰北部工业区、西班牙,一直步入到《1984》中的大洋国。温斯顿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泯灭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反抗的凭借是其个人的自由意志:恢复个人记忆从而破除极权主义的历史叙述,书写内心的真实体验从而从“新话”对思想的控制中挣脱开来,从底层无产者中感受和发掘战胜极权主义的人性和力量,义无反顾地参与反抗,在友爱部的囚室绝望地抗争。尽管他的一切反抗都彻底失败,最终被成功地改造,但是反抗本身不是徒劳的。温斯顿的反抗和失败的过程,在他身上所承受的监视、诱骗、拷打、磨难和思想改造,充分展示了极权主义戕害人性所能达到的地步,同时,他寻找自我主体性的努力正是动摇极权主义统治的根本所在。

温斯顿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抗,萌生于心灵和思想上对于极权社会的质疑,最初是头脑中秘密的不自觉的念头,继而是他写日记的行为。通过日记,他从思想进入了语言,再从语言进入了行动。在《1984》中,写日记如被发现,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 25 年。温斯顿在险恶的环境下写日记,就是独立思考的开始,他面对历史和未来表述自己的真实感受。

奥威尔认为,温斯顿写日记的价值在于保持清醒的理智,在千篇一律的极权主义的时代,写日记作为一种重要的反抗形式,使得主人公恢复了自己

的心灵自由和独自思考的能力,恢复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的能力,恢复了用自己眼睛来观察真实世界的能力,在极权主义重重谎言的迷障中触摸到了真实。通过记日记,温斯顿还恢复了属于自己的记忆,动摇了伪造的历史。极权主义的实质就是消除个体的主体性,人只是物化的客体,是监控的对象、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被煽动催眠的群氓或是被迫害的罪犯。而一旦开始思想犯罪,人就开始独立思考、行动,重新找到自我的主体意识,这是对极权社会的极大威胁。

米兰·昆德拉在其《笑忘录》中曾说:“人类对抗权力的艰苦奋斗,就是记忆对抗遗忘的挣扎”。^[2]在大洋国,国家控制着过去,个体失去了记忆。温斯顿独立而自由的心灵和思想,在一个普通的年代,看似普通而平凡,但由于他身处极权社会,这一切原本属于常识的追求,都已成为危险的死罪,而他冒死维护这种基本的人性的行动,体现出灿烂的光辉。自由、温情、真诚等基本人性,是对抗极权主义的有力武器。

二 身体反抗与性政治

《1984》中,另一个着力塑造的反抗型人物是女主人公裘莉亚。裘莉亚以及她与温斯顿的爱情是小说中令人惊心动魄的篇章,是反抗极权的一道曙光。小说的第二部中,裘莉亚与温斯顿用身体做武器,从行动上来反抗极权主义。

《1984》中的极权国家,政治极权渗透到公共生活、私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其中突出的就是极权主义的性政治——对于女性身体、形象、情感、社会地位进行全面规训和控制,制造特殊的“中性人”。^[3]奥威尔认为极权政治对女性的侵害,使得女人丧失了属于女人的天性和气息。裘莉亚对于极权主义的对抗性,就是要在使得女人不能成为女人的时代,回复女性自我。裘莉亚的理想是在男人面前涂上胭脂,扑上粉,用上香水,穿上一件真正的女人衣裙,成为取悦于心爱男人的女人。

《1984》中的大洋国,社会控制的主要原则和信条就是支配和绝对的权力,它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和思考权,女性成为阴暗的中性人,女性美成为罪恶。极权统治者之所以要消除女性的性特征,要使得性成为肮脏的行为,其目的不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还在于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性本能创造了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

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裘莉亚的反抗方式是让自己成为女人,不仅在穿着打扮上,而且要使性爱成为欢愉,用身体来作为叛逆的武器,用享受肉体的激情来反抗。温斯顿也从围绕裘莉亚所发生的性爱的事件中感到充满希望,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把极权搞垮的力量。在《如此欢乐童年》一文中,奥威尔曾阐释过反抗的根本原因:“在一个强者主宰的世界上,弱者(必须)打破规则,否则就完蛋……弱者有权为自己建立一套不同的规则。”^[4]面对极权的禁欲主义性政治,性爱成为能够腐化、削弱、破坏极权的事情。

温斯顿和裘莉亚的“非法”性爱是一种激烈的叛逆。裘莉亚反叛了对极权的愚忠;温斯顿在身体的反抗中,找回了男性被剥夺的权力,恢复了自己的男性气质,寻找回爱的能力,这都是极权统治者要剥夺的。温斯顿在与友爱部施暴者的抗争中,当一切精神的支撑都被摧毁时,他还试图保留内心深处对裘莉亚的爱。他认为爱是极权统治者无法剥夺的。在101囚室,面对极端残酷的刑罚,温斯顿最后叛卖了裘莉亚,极权主义最后也是最费力气要剥夺的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温斯顿与裘莉亚其实都明白,他们的这种反抗行为对于极权暴政而言,是无力和疯狂的,他们越是享受性爱的欢愉,就越是向坟墓跨近一步。他们做爱的床是直接通向友爱部的地下室。但是,在性欲本身就是思想罪的时代,男女主人公的性爱确实是造反。极权时代没有一种感情是单纯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男女主人公的每一次拥抱就是针对极权统治的一场战斗,是对极权主义的打击,性爱成为一件政治行为。尤其是裘莉亚,她那健旺奔放的生命力、果敢的行动、对快乐的追求、女性直觉的敏锐、聪颖的处世之道,给阴郁窒息的世界带来难得的光亮,也使人看到极权暴政的有限性。

三 革命及其悖论

终其一生,奥威尔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同情和向往革命,并在西班牙浴血奋战,险些牺牲在法西斯军队的子弹下。同时,他从来抗拒那种从抽象的理论逻辑来看待革命的现象,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由理念推理出来的乌托邦,而是经济平等、政治平等、个人自由、精神独立的社会主义。在《1984》中,奥威尔也着重写到了革命,认

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推翻极权社会。但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破除了对于革命的简单崇拜和幻想,特别是流行以革命作为解决危机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妙方之时,他写出了革命如何变异为革命者内部的倾轧,革命如何建立了更严酷的统治秩序,如何最终走向奴役之路。

在《1984》中,奥威尔把希望寄托在无产者身上。在极权统治无处不在的恐怖而令人窒息的世界,主人公温斯顿于日记中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5][6]}

西班牙内战期间所经历的事件,坚定了奥威尔的信念: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知识分子或理论家才是法西斯的真正的敌人。在二战中,他也希望英国的工人阶级在同希特勒的较量中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1984》中始终有一种信仰,极权主义最后只会被无产者推翻,也只有无产者能成功反抗极权主义。无产者的体内积累着有朝一日会推翻整个世界的力量。

奥威尔意识到希望在无产者身上,只是由于无产者保留了自己的人性和价值观。小说中写到:“无产者是人,我们不是人。”在大洋国,只有无产者仍旧保留着人的基本品性。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体制,却相互忠于对方。他们的怜悯心、同情心以及对爱的表达,蕴含着道德的力量。无产者仍有人性,仍保有原始的感情,因此他们才是有朝一日会爆发出生命来振兴全世界的蛰伏的力量。

小说中的一些片段写了无产者如何顽强地保留了善良人性。看到战争电影里直升飞机炸毁敌国的救生艇的情景,党员们发出很多的掌声,但是有无产者妇女大声说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一次火箭袭来时,也是一个无产者才使温斯顿免遭死于非命,只有无产者还保有人与人之间毫无芥蒂的关心。奥威尔充满诗情地描绘了一个胳膊通红的洗衣妇在劳动中唱歌的情景,她的歌声悦耳动听,充满了一种欢愉之情。相形之下,从来没有一个党员独自或自发地在唱歌。“对于奥威尔而言,显然她代表了他所渴望的那些品质:满足、思想平静、不易激动、快乐。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他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中发自内心的评论:“在工人阶级的家里……你感受到的是别处所不易找到的温馨、体面、充满人性的氛围。”^[6]

不过,奥威尔写到的革命与希望,也存在着悖论。无产者反抗的可能性,与其现实处境相矛盾。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这也是现代革命的悖论所在。无产者自发生成的革命显得极度渺茫,他们潜在的造反力量在可见的未来遥不可及。

至于小说中写到的革命行动,是一个党内分化出来的兄弟会的秘密行动。谣传存在一个所谓党内叛徒、变节分子、人民公敌果尔德施坦为头的兄弟会,这个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如果兄弟会真的存在,它作为一种“革命党”的雏形,其内在地蕴涵着革命的异化。兄弟会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先锋队,革命的过程,首先是秘密积累反抗极权的知识,逐渐扩大启蒙,最后发生无产阶级造反,推翻英社党和老大哥的统治。在兄弟会及其领袖看来,无产者没有觉悟、没有组织,必须由先锋队来使其觉悟,对其组织。而对于无产者来说,推翻了英社党和老大哥的统治,又可能会迎来了一群新的暴君。其实,《1984》中的大洋国本就是一次革命的产物。按照大洋国宣传机构——真理部的历史叙述,英社党和老大哥的那场革命把无产者从原来统治者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然而,革命后的大洋国,真正的状况却是金字塔结构的极权国家的建立,无产者依然处于被统治的从属地位。

而且,更严酷的是,兄弟会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它与与英社党在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也是《1984》中思考的问题。小说中有一段这样的对答:

奥勃良向温斯顿问到:

“你们准备献出生命吗?”

“是的。”

“你们准备杀人吗?”

“是的。”

“你们准备从事破坏活动,可能造成千百个无辜百姓的死亡吗?”

“是的。”

“你们准备把祖国出卖给外国吗?”

“是的。”

“你们准备欺骗、伪造、讹诈、腐蚀儿童心灵、贩卖成瘾毒品、鼓励卖淫、传染花柳病——凡是能够引起腐化堕落和削弱党的力量的事都准备做吗?”

“是的。”

“比如,如果把硝酸水洒在一个孩子的脸上能够促进我们的事业,你们准备这么做吗?”

“是的。”

“你们准备隐姓埋名,一辈子改行去做服务员或码头工人吗?”

“是的。”

“如果我们要你们自杀,你们准备自杀吗?”

“是的。”

“你们两个人准备愿意分手,从此不再见面吗?”^{[5]154-155}

……

对于革命者而言,没有严格的纪律、坚强的组织,没有视死如归的成员,也就难堪大任。但是当兄弟会真的按照这些誓词来革命时,它与大洋国的英社党又有多大的差别?革命者把命运交给革命摆布,并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犹豫地不择手段,这其实可以看到革命与极权的互动。假如有一天,这场革命得以爆发,也许会建构一种比大洋国更酷烈的极权统治,这是一种自我吞噬的革命。奥威尔的目的是要说明这种革命(暴力的、爱搞阴谋的、由无意识的对权力饥渴的人所领导的)只能导致一群领导人代替另一群领导人。他实际上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包括在壮怀激烈、抱着牺牲决心进行反抗和革命时,也要警惕其中隐伏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危害。

参考文献:

- [1] 奥威尔. 1984[M]. 董乐山,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185.
- [2] 米兰·昆德拉. 笑忘书[M]. 尉迟秀,译.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8.
- [3] 董 英. 《1984》中的女性形象探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01-103.
- [4] 杰弗里·迈耶斯. 奥威尔传[M]. 孙仲旭,译.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391.
- [5] 奥威尔. 1984[M]. 董乐山,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6] J R Hammond. A George Orwell Companion[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183.

责任编辑:卫 华